

## 試論王夫之易學三變

李皇穎<sup>\*</sup>

### 摘要

明遺王夫之《易》學主要著作，有《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周易大象解》、《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周易內傳發例》等。本文嘗試從遺民學的視角出發，探究王夫之（1619—1692 A.D.）的易學在不同階段發展與主張及其多元的解《易》方式與特色。明遺王夫之研《易》凡四十載，歷經三變，呈現耀眼的《易》學光芒，其研《易》雖歷經三變，然其重視人事的宗旨是不變的，表現了遺民學，重用世、反空虛的特色。就各期易學著作特色乃至易學發展史而言，王夫之易學有著諸多貢獻，《周易稗疏》力駁宋人圖書之謬，清初學者繼之，對宋人圖書之學作深入地考證，解決了易學研究上的一大疑案。《周易外傳》以援史證易為主要特點，乃典型史事易學專著。《周易大象解》發揚聖學，攻訐佛老，發揮經世致用的精神。《周易內傳》與《周易內傳發例》，是其一生易學思想之總整理，「乾坤並建」與「占學一理」等主張，修正朱子的理論，在易學史上超越了朱子的思想水平。明遺王夫之的易學成就，代表朱子以後的再一次易學總結，也代表研易態度的轉變，由明末空談性理，轉向通經致用的經學，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

**關鍵詞：**王夫之、朱熹、《周易稗疏》、《周易外傳》、《周易內傳》

---

<sup>\*</sup>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On Wang Fuzhi's Book of Changes

Lee Huang-Yi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Dayeh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main works of Wang Fuzhi in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study of "Yi" include "Zhou Yi Shu", "Zhou Yi Kao Yi", "Zhou Yi Xiang Jie", "Zhou Yi Wai Zhuan", "Zhou Yi Nei Zhuan", "Zhou Yi Nei Zhuan Fa Li", etc.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advocacy of Wang Fuzhi (1619-1692 A.D.)'s Yi studies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his diverse way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reting "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min studies. Wang Fuzhi of the Ming Dynasty has been studying "Yi" for forty years. After three changes, he has shown a dazzling light of "Yi" study. Although his study of "Yi" has gone through three changes, his purpose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human affairs remains unchanged, which reflects the dazzling light of "Yi" study.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using the world and anti-emptiness.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ixue works in each period and eve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Yixue, Wang Fuzhi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Yixue. "Zhou Yi Baishu" vigorously refutes the fallacies of the Song Dynasty's books.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s followed suit and mad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Song Dynasty's book study and solved the problem. A major mystery in the study of Yi studies. "Zhouyi Waizhuan"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supporting history to prove the Yi, and it is a typical historical monograph on the Yi study. "The Elepha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promotes sacred learning, criticizes Buddhas and elders, and displays the spirit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world. "Zhouyi Neizhuan" and "Zhouyi Neizhuanfa" are a summary of his Yixue thought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advocated "the simultaneous construction of Qian and Kun" and "one theory of fortune-telling", revised Zhu Xi's theory, and surpassed him in the history of Yixue. Understand Zhu Xi's level of thought. The achievements of Wang Fuzhi in the Ming Dynasty represented another summary of the study of the Yi after Zhu Zi, and also represented a change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studying the Yi, from empty talk about human na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a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at understood the classics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al use, playing a key role as a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Keywords: Wang Fuzhi, Zhu Xi, "Book of Changes", "Book of Changes",  
"Book of Changes"**

## 壹、前言

徐世昌《清儒學案》云：「船山平生為學神契橫渠，羽翼朱子。」朱伯崑《易學哲學史》於清代部分，論述王夫之《易》學部分，足足用了將近兩百六十頁之多，王夫之在中國《易》學史上之重要，不言自明矣。身歷明清鼎革之際的明遺王夫之，生於明萬曆 47 年(1619)，卒於清康熙 31 年(1692)，享年七十四。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先世為江蘇高郵人，明永樂間遷於湖南衡陽，遂定居。晚歲於石船山下築草堂以終老，故世稱船山先生。船山《易》學著作，有《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周易大象解》、《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周易內傳發例》等，另有關涉《易》學者，如《思問錄》、《張子正蒙注》，至於以《易》說理、評史、論政、言志而散見於其他哲學、史學、政論、詩文中者，如《讀四書大全說》、《尚書引義》、《莊子通》、《俟解》、《讀通鑑論》、《續春秋左氏傳博議》等，更是不勝枚舉。他的《易》學成就除了對《周易》經傳本身的研究外，主要在藉《易》構建一個龐大精深的哲學體系。<sup>1</sup>

「遺民」一詞，兼具歷史性、政治性與文化性。所謂「遺民」，即凡處於易代之際的士子，其謹守忠義，恥仕新朝，而以維護前朝政權，傳承故國文化及精神，為終身職志者，可謂之遺民。而所謂「明遺」，蓋指身跨明、清兩朝，歷經崇禎甲申國變（1644），其謹守忠義，恥仕新朝，不願與清廷採取合作態度，而以維護明朝政權，傳承故國文化及精神，為終身職志者。<sup>2</sup>過去從事研究王夫之易學者，大多從哲學的立場出發，或結合學術思想史、社會史、易學史，為王夫之易學做出詮釋，然從遺民學的立場考察王夫之易學者寡矣。<sup>3</sup>本文嘗試從遺民學的視

<sup>1</sup> 朱伯崑指出，不研究王夫之的易學哲學，就不能揭示出其哲學在哲學史上的地位。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臺北：藍燈，1991 年 9 月），頁 6。廖名春也認為，王夫之的易學成就，主要在藉《易》構建一個龐大精深的哲學體系。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 7 月），頁 332。

<sup>2</sup> 李皇穎：〈明遺葉矯然史事易學特色〉，《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18 期（2016 年 11 月），頁 28。

<sup>3</sup> 汪學群述及，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和蕭漢明《船山易學研究》，前者側重本體論，後者傾向於辯證法，都是從哲學的角度研究王夫之易學。汪學群著《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一書，則力圖把社會史、學術思想史、易學史結合起來，作全面的系統考察。詳參汪學群：《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 5 月），前言。其後汪氏《清初易學》一書，始從明遺視角考察王夫之，將王夫之《易》學歸類為明遺的宋易學，且集宋明以來義理易之大成，對王夫之《易》學推崇備至。然其未將清初易學諸流派，如史事宗易學等等，盡賅其中，故無以盡窺清代易學全貌。黃忠天即指出，汪氏書中將清初易學分為明遺的宋易學、明遺的程朱易學、明遺對宋易圖書先天太極說的批評、清廷的程朱易學、儒臣的程朱易學、儒臣對宋易圖書先天太極說的辨偽等六部份，並將清初易學家及敕撰諸書歸類之，然其歸類仍欠周全，亦待商榷。詳參黃忠天：〈葉矯然《易史參錄》述要〉，《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4。蓋汪氏歸類有兩大依據，依政治傾向分為兩類，一者明代遺民，二者儒臣易學與官方易學；依學術宗旨角度分為三類，指宋易學、程朱易學、批評與考辨宋易圖書先天太極說。筆者認為，汪氏分類確有未周全之處，依政治傾向分類而言，如李光地奉敕撰《周易折中》，顯然屬於官方易學，但汪氏將《周易折中》歸於「清廷的程朱易學」，李光地歸於「儒臣的程朱易學」，將作者與著作，截然劃分，實在令人費解；又依學術宗旨角度分類而言，就一般易學史而言，宋易可概分成圖書學派、儒理派、史事易學三派，汪氏分類僅含括其中兩派，缺漏了史事易學派，乃其未竟之處。詳參李皇穎：〈試論明遺吳曰慎之史

角出發，將王夫之研《易》歷程概分為四個階段，以其身處時代鉅變，加以身世遭遇，而有學術精神的轉折，因之呈現不同時期的《易》著特色，故有《易》學三變。

## 貳、王夫之《易》學三變

王夫之治《易》與人生現實緊密聯繫，其注《易》即其一生踐履之自況，而其於《易》之所得，亦為其一生學問之統緒。<sup>4</sup>概觀王夫之研《易》歷程，凡有三變，以下略述之。

### 一、徵實之學奠基石

王夫之一生志節與學問，實賴早年賢父兄之善教也。四歲時，初入家塾，從長兄石崖公受讀，七歲時讀畢十三經，十歲始從父武夷公受經義，十三歲父罷選歸隱，身受其方嚴之教。此時期，王夫之受父兄教訓成材。尤其，武夷公學宗濂洛正傳，不與當世王學禪風相合，故王夫之一生惡王學末流之狂禪，而推宗張載之正學，實多受武夷公之感發也。<sup>5</sup>

《易》學乃王夫之學術基礎，為其一生所關注焦點，據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自述其研《易》過程，云：

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於讀《易》，戊子避戎於蓮花峰，益講求之，初得觀卦之義，服膺其理，以出入於險阻而自靖，乃深有感於聖人畫象繫辭，為精義安身之至道，立於易簡以知險阻，非異端竊盈虛消長之機，為翕張雌黑之術所得，與於學易之旨者也。<sup>6</sup>

甲申（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滿清入關。清順治3年，丙戌（1646），王夫

事易學》，《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1卷第22期（2015年7月），頁169。

<sup>4</sup> 朱伯崑以為，王夫之一生皆從事於易學的研究，而且同其一生的遭遇息息相關，具有時代的特徵。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6-7。廖名春說明，王夫之治《易》達四十年之久，寫成易學專著六部，易學思想散見於其他哲學、史學、政論、詩文中，不勝枚舉。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頁332。

<sup>5</sup> 有關王夫之家學淵源，請參曾昭旭：《王船山哲學》（臺北：遠景出版社，1983年2月），頁3-12。惟王夫之易學與張載的關係是如何的呢？朱伯崑強調，王夫之的易學有其發展過程、特徵及其貢獻，若將王夫之易學傳統僅歸之於張載，是不妥當的。就《周易稗疏》、《周易外傳》而言，受張載影響較少，晚年以闡發張載易學哲學為己任，所著《周易內傳》、《正蒙注》雖以張載學說為易學之正統，然《正蒙注》中，多借注《正蒙》來闡發自己的易學哲學體系。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8-9。筆者認為，朱伯崑所言，大抵若合符節，然《周易外傳》已多處引用張載思想，據以解《易》，不僅繼承、發揮張載思想，更為其學說做辯護，此不可不辨也。詳參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頁141。

<sup>6</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臺北市：夏學社，1980年），頁646。

之年二十八，乃崇禎殉國後二年。弘光、隆武等南明小朝廷相繼滅亡，王夫之舉兵抗清，過著顛沛流亡的生活，舉兵失敗後匿黑沙潭上續夢菴，痛稍定之時，致志於《易》注，逢家難國變，乃益講求之，遂漸得於《易》之大旨，著有《周易稗疏》四卷和《周易考異》一卷。

《周易稗疏》和《周易考異》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sup>7</sup>《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周易稗疏》四卷附《周易考異》一卷）是編乃其讀易之時隨筆劄記，故每條但舉經文數字標目，不全載經文，又遇有新義，乃為考辨，故不逐卦逐爻一一盡為之說。」<sup>8</sup>王夫之選擇性地對《周易》經傳本文進行訓詁注釋，考證經文，闡釋義理，初步建構了他的易學思想。

王夫之重視《周易》經傳文字的校勘訓詁，如《周易·咸卦·上六象》：「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王夫之《周易稗疏·下經·滕口說也》云：「舊說滕與騰通，按騰者，駿馬超驤之謂，使口說如之，則亦卓絕之偉論矣。滕字從水，水涌出曰滕。……不當作滕驤之滕。」<sup>9</sup>此以文字訓詁考證，批駁程朱舊說之謬也。<sup>10</sup>

再者，如《周易·乾卦·上九》：「亢龍有悔。」王夫之《周易考異·亢龍有悔》云：「說文，亢作忼，音口朗反，又苦浪反，即忼慨之忼，直前不讓之意，故曰知進而不知退，今文作亢，於象義未盡。」<sup>11</sup>此處，王夫之根據《周易·文言·乾》：「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逕取《說文解字》：「忼，忼慨也。」<sup>12</sup>而不取《說文解字》：「亢，人頸也。」<sup>13</sup>以為此說較符合卦象之義。足見王夫之考訂文字之形音義，並取證卦象，不僅止於訓詁注釋或考證經文，亦潛露其易學見解，實已奠定其易學思想體系之基礎。

四庫館臣云：「言必徵實，義必切理，於近時說易之家，最有根據。……皆具有條理，卷帙雖少，固不失為徵實之學焉。」<sup>14</sup>此一評論大抵反映了，這個時期王夫之易學的最大特色在於徵實之學。劉大鈞《周易概論》便指出，王夫之《周易稗疏》力駁宋人圖書之謬，學風所及，毛奇齡撰《圖書原舛編》，黃宗羲撰《易學象數論》，黃宗炎撰《圖書辨惑》，皆對宋人圖書之說進行了考證，至胡渭撰《易圖明辨》，確鑿地考證，解決了易學研究上的一大疑案。<sup>15</sup>

此外，王夫之《周易稗疏》屢屢批判京房、邵雍之學，壞亂聖典，貽害無窮，如《周易稗疏·繫辭上傳·天一地二》云：「凡此類皆同兒戲，徒亂聖經，京房背焦贛之師說，以崇讖緯，

<sup>7</sup> 《周易稗疏》4卷，著於王夫之28歲之時，是其易學的第一部著作。《周易考異》1卷，大約晚於《稗疏》。詳參曾昭旭：《王船山哲學》，頁50-51。

<sup>8</sup>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頁150。

<sup>9</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711。

<sup>10</sup> 《易程傳》：「騰揚於口舌言說。」朱子《周易本義》：「滕、騰通用。」詳參清·李光地：《周易折中》（臺中：瑞成書局，1998年），頁1207。

<sup>11</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747。

<sup>12</sup> 《說文解字》：「忼，忼慨也。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一曰易忼龍有悔。」詳參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1994年7月），頁507。

<sup>13</sup> 《說文解字》：「亢，人頸也。從大省，象頸脈形。」詳參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501-502。

<sup>14</sup>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50。

<sup>15</sup> 劉大鈞：《周易概論》（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12月），頁218。

邵康節陰用陳搏之小道，而倣丹經，遂使天一生水云云之遁辭橫行，天下人皆蒙心掩目奉之為理數，且引以證此章之旨，是釋經之大蠹，言道之荊棘也，不容不詳辯之。」<sup>16</sup>又如《周易稗疏·繫辭下傳·兩儀生四象》云：「邵子之術繁冗而實淺，固其不足從以經考之自見，故讀易者以不用先天圖說為正，以其雜用京房、魏伯陽、呂巖、陳搏之說也。」<sup>17</sup>故四庫館臣云：「大旨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sup>18</sup>

《周易·繫辭下傳》：「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青年時期王夫之，身處亂亡之際，雖顛沛流離，卻益發堅強剛毅，沉潛內斂，藉憂患險阻之激憤，而勘入易理，初步建立其易學思想體系。此外，王夫之治《易》的態度，由空談虛理走向到講求實證，以通經致用，此一學風的轉變，影響所及，清初徵實之風盛矣。

## 二、初變一史事易學重實用

王夫之《易》學，來自其一身之際遇與家國之憂患，此乃切切實實之體驗，非懸空幻想之虛境，故其《易》學必不離人事也。乙未（1655），夫之年三十七，勤王失敗，決志歸隱之初，於晉寧山寺，始為《周易外傳》七卷。蓋船山一生學術思想之根本見地，初表現於此書，其後但有補充開展以至於細密周備，而無根本之歧異也。

《周易內傳·發例》述及王夫之研易過程，云：

乙未（1655），於晉寧山寺，始為《外傳》，丙辰（1676），始為《大象傳》。亡國孤臣，寄身於穢土，志無可酬，業無可廣，唯《易》之為道則未嘗旦夕敢忘於心，而擬議之難，又未敢輕言也。<sup>19</sup>

乙未（1655），乃順治十二年，明永曆9年，約為夫之而立之年後七年。時值明清鼎革之際，夫之隨地託跡，無有定所，暫棲晉寧山寺，雖身陷蹇困，仍不忘為學，嘗為從遊諸生講《周易》，始撰《周易外傳》。<sup>20</sup>蓋王夫之為前明遺逸，志節皎然，乃假學《易》以寄其忠悃，藉天

<sup>16</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728-729。

<sup>17</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732。此須細論者，孟喜、京房二人，在易學史上關係密切，王夫之在《周易稗疏》乃至《周易外傳》等著作雖對京房八宮、納甲諸說，頗有微詞，然對孟喜之說卻未置可否，由斯可見，王夫之對漢代易學的態度，並非全然接受或全盤否定，而是批判式的繼承。詳參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頁138。

<sup>18</sup>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50。王夫之所以反對京房之術，先天諸圖，邵雍之說，其理由是，王夫之認為京房八宮之說，乃勉強湊合卦象以立論，附會穿鑿，實不足信，如《周易外傳·說卦傳》：「京房分八宮為對待，不足於象，而又設游魂、歸魂以湊合之，尤其不足言者也。」又如《周易外傳·序卦傳》：「此京房八宮世應之術，邵子八八相乘之數所以執一以賊道，而《周易》之妙則固不然也。」王夫之於此提出乾坤並建的主張，指出京房八宮世應之術、邵子八八相乘之數，與《序卦》所言卦序，皆未能盡《易》之妙。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1026、1044。

<sup>19</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646。

<sup>20</sup> 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同治四年湘鄉曾氏金陵節署刻船山遺書。

道以明人事，故有《周易外傳》之作也。

《續修四庫提要·周易外傳》云：「夫之〈周易內傳發例〉稱乙未於晉寧山寺，始為《外傳》。按：乙未為順治 12 年，明永曆 9 年，在夫之咯血解職之後。夫之自謂《外傳》以推廣於象數之變通，極酬酢之大用。」此據夫之〈周易內傳發例〉一文，言夫之作《外傳》之背景與動機，與明清鼎革之際，政局丕變關係密切。又云：「其實夫之從永明王於廣西，其時權臣恣肆，朋黨交訐，諫不行而言不聽，憤而丐去，假學《易》以明其忠愫，如說屯卦之義曰：……此子家羈所以消心於返國；司空圖所以僅託於巖棲也。說隨卦之義曰：……孔甲之抱器歸陳涉，有苦心焉，而无其德；魯兩生之謝漢高，而需百年，抑恃其德而失其時。」說明經歷國朝滅亡的慘痛，滿清侵逼的悲哀，退居野處的無奈，王夫之藉《易》以寄其志，並指出《周易外傳》講求經世致用，援史證《易》之特色。<sup>21</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易類序》論易學史，有「兩派六宗」之說，而史事宗為六宗之一。蓋史事《易》學，乃援引史事以參證易理之謂也。史事《易》學家，乃以援引史事參證易理為其釋《易》主要特色者。<sup>22</sup>王夫之《周易外傳》援史證易為其主要特點，其援引史事者，就卦數言，有四十九卦之多，佔全書四分之三以上，而無例之卦，僅小畜、泰、坎、咸、恆、損、萃、革、漸、歸妹、豐、巽、中孚、小過、小濟，計十五卦，不及全書四分之一。王夫之引史證易，除六十四卦之外，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亦每每援史證易，王夫之誠屬典型史事易學家。<sup>23</sup>

王夫之《周易外傳》援史證易之例甚夥，尤其，關於隱逸之士的出處，王夫之具有獨到見解。蓋《孟子》：「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王夫之早年攻讀經史，專意舉業，曾中秀才、舉人，以經世致用為其志。明亡時，投入反清復明運動，曾供職於南明朝，因意見相左而告歸，寓居晉寧山寺，講學著述，以待時用。<sup>24</sup>

計《外傳》一書，自撰作（1655）及至刊刻流傳（1865），相隔大約二百一十年之久，學術傳承流行之難，於此可見。朱伯崑指出《周易外傳》和《周易內傳》乃王夫之易學之代表作，而《周易外傳》因不受經學體例的約束，理論思維尤豐富。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 7。曾昭旭：王夫之學問思想，學術系統之根本見地，始挺立於三十七歲作《易外傳》之時。詳參曾昭旭：《王船山哲學》，頁 44。足見《周易外傳》一書，實夫之《易》學，乃至整體學術思想之基磐。

<sup>21</sup> 汪學群認為，王夫之《周易外傳》之作，在於治《易》不限於《周易》文字的校勘和訓詁，而在於論述象數的變化法則，運用《周易》的理論思維，解釋自然與人生的問題，具有通經致用的特色。詳參汪學群：《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頁 43。

<sup>22</sup> 黃忠天指出，所謂史事易家，宜具備下列三項條件，其一該書應以援史證《易》為其主要釋《易》特色；其二該書引史證易情形，就六十四卦或扣除闕殘諸卦言之，應達五分之四以上；其三該書引史證《易》情形，就三百八十六爻或扣除闕殘諸爻言之，應達一百九十三爻或過半以上者。史事易家至少應具備上述三項條件之一，其中尤以第一項最為緊要，其他兩項有關量化部分猶可斟酌。史事易家引史，有時一爻中引史多達數則以上，有時其引史亦見諸《十翼》中，誠難以估算，因此，上述所示典型史事易家其引史最低參考基準，且以較簡便之卦爻論之。詳參黃忠天：〈史事宗易學研究方法析論〉，《周易研究》第 5 期（總第 85 期），2007 年，頁 41。

<sup>23</sup> 詳參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頁 136。

<sup>24</sup> 此時夫之年約卅七，正值壯年時期，為時人講《春秋》，作《周易外傳》，猶存用世之心，殆至五十七歲，始真正隱居石船山下湘西草堂，著述以終。

觀王夫之援史證《易》，舉隱逸之士為例，吾人可藉此探討其對於隱士的出處態度，進而窺見其思想意蘊。如蠱卦，王夫之注云：

申屠蟠之辭召也，陶弘景之挂冠也，庶幾以之，而范希文以謂嚴光也，則非其類矣。如光者，交不待出門而固合，意可以承考而亡疑，奚其傲文叔以相臣，而致惜於君房之要領哉！<sup>25</sup>

引東漢嚴子陵辭光武帝之召，隱居不仕之例。觀王夫之言外之義，對於子陵不能挺身出仕，似有輕責之嘆，蓋其未能堅守傳統儒者，達則兼善天下之志也。<sup>26</sup>又如謙卦，王夫之注云：

施者貨賄之事，裒益者厭足之道也。……鹿臺之賁，所謂善人者，亦沫土之翩翩者爾，故受裒多之錫而鳴其富，豈可施之首陽之二士乎？<sup>27</sup>

殷商末年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居首陽山，采薇而死，王夫之讚其高潔。<sup>28</sup>《周易外傳》其他引伯夷、叔齊為史證之例，如大過卦，王夫之注云：「故夷、齊兵之而不畏。」（《船山易傳》，頁838。）又如繫下，王夫之注云：「伯夷餓，太公封，俱為大老。」（《船山易傳》，頁1015。）蓋夷、齊反對武王伐紂，而太公助武王伐紂，夫之認為兩者雖因身分不同，取擇相殊，然皆有可取之處。可見王夫之對隱士的態度，乃取其心志節操，非其表象作為，而對於身懷濟世之志者，亦未加以貶責。

觀《周易外傳》書中，援引史事為證，對於隱士的出處態度，大抵仍紹述儒家「有道則進，無道則退」的主張。<sup>29</sup>王夫之雖認為君上無道則隱，然更強調盛世之時，才德之士，不當隱而不出。蓋王夫之雖不見用於時，仍存用世之志，或稍寄於筆端，於斯可見乎！

王夫之《周易外傳》援史證《易》，誠有其深切著明之效，裨益學者，蓋亦有功矣。然以其幾乎卦卦有史，引史數量甚夥，難免偶有牽合者，如《周易外傳·噬嗑》以蘇秦車裂為例，於卦爻義不符。再如《周易外傳·睽卦》舉蔡攸與其父蔡京反目，與爻旨未能契合。誠如《續四庫提要·周易外傳》所云：「其言感慨淋漓，雖不必為經義之所應有，尚論者亦可以悲其志事矣！」王夫之引史證《易》，不免有牽強與疏誤之病，然其援引史事，實有深切著明與切於

<sup>25</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808。

<sup>26</sup> 其他引嚴光為史證之例，如比卦，王夫之注云：「光武無猜，而嚴光且以要領之絕戒侯霸也，又況在不寧初來之世也哉！」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786。

<sup>27</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803-804。

<sup>28</sup> 其他引伯夷、叔齊為史證之例，如大過卦，王夫之注云：「故夷、齊兵之而不畏。」（《船山易傳》，頁838。）又如繫下，王夫之注云：「伯夷餓，太公封，俱為大老。」（《船山易傳》，頁1015。）

<sup>29</sup> 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詳參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論語注疏附校勘記，2001年12月，卷8），頁72。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詳參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2001年12月，卷13上），頁230。



人事之效者，論其得失，誠為大醇小疵也。<sup>30</sup>

與前期相較，這期最主要的特色，已不限於對《周易》經傳文字的訓詁考證，而是側重於經世致用的精神闡發，而以援史證易為主要表現形式。呈現了遺民《易》學重用世、反空虛的特色。<sup>31</sup>此外，與前期《周易稗疏》和《周易考異》相較，《周易外傳》已多處引用張載之說，據以解《易》，繼承、發揮了張載的思想，甚至為其辯護，值得吾輩留意。<sup>32</sup>

### 三、再變一弘揚聖學反佛老

丙申（1676），夫之年五十八，迫於吳三桂而感於時之變也，居石船山下湘西草堂，始為《周易大象解》一卷。此書雖僅有一卷，但對《周易》的義理思想已臻成熟，內容廣泛，見解獨到之處頗多。

《周易大象解》是此時期主要代表作，其內容主要在發揚聖學，故而貶抑異端，攻訐佛老。<sup>33</sup>王夫之強調研究《周易·大象傳》，貴在「盡人合天」，《周易大象解·序》云：「若夫學易者，盡人之事也，盡人而求合乎天德。」<sup>34</sup>他認為《周易》是一部人生修養的教科書，學易者當盡人事以合天德，修己治人，撥亂反正。又云：「大象，聖人之所以學易也，無大過者，謙辭也。聖人之集大成以時中而參天地，無過之盡者也。聖學之無所擇，而皆固執者也。……君子學聖人之學，未能至焉，而欲罷不能。」<sup>35</sup>說明君子學易，當效法聖人知幾寡過，擇善固執，進而以發揚聖學為己任。

在《周易大象解》一書中，王夫之以入世的精神，闡揚聖學為宗旨，職是之故，對於站在儒家聖人之學對立面的異端，便加以區隔貶抑，甚而對於佛老學說，進行嚴厲攻訐。<sup>36</sup>王夫之

<sup>30</sup> 詳參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頁154-155。

<sup>31</sup> 就《易》學發展史來看，遺民《易》學具有四大特色：重用世、反空虛、眷顧國、尚氣節。詳參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頁24-36。

<sup>32</sup> 如《周易外傳·未濟》發揮張載《正蒙·太和》「仇必和而解」，陰陽相需相濟之理。又如《周易外傳·繫上一》以天無思慮，解釋「清虛一大」，乃夫之對於程、朱一派質疑張載之說的回應。詳參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頁141。

<sup>33</sup> 事實上，王夫之在《周易外傳》中，在宇宙論方面，除了發揮張載的「氣學」，說明宇宙萬物的生成演化之外，更進一步提出「道器不離」、「盈天下皆器」等主張，如《周易外傳·大有》云：「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又如《周易外傳·繫辭上》云：「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實針對佛、道而發，以此反對佛、道「離器言道」或「器外求道」之說。朱伯崑便指出，王夫之依其「天下惟器。」說，尖銳地批評佛、道兩家，以及玄學派和理學派的離器言道和器外求道說。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139。

<sup>34</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651。

<sup>35</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652。

<sup>36</sup> 王夫之於《周易外傳》中，多處指出佛、老為異端、鬼道、小人之道，對佛、老的批判，可謂不遺餘力，如屯卦，王夫之云：「二氏之說（佛、老），鬼道也。」震卦，王夫之云：「而異端之說，繇此其昌矣。」《繫下·四》，王夫之云：「夫小人之道，則亦有一之說矣。……載營魄以始，抱一以終；萬法以始，歸一以終。……故聖人之與異端（佛、老）均言一矣。」足見王夫之反對佛、老，並非憑空妄造，皆能指出其立論緣由，在思想和方法上，出入佛、老，在和佛、老的論辯中吸取了豐富的

往往刻意舉聖學與異端相較，如《周易大象解·乾》：「其流為釋墨，不知用乾者也。……其流為莊列，不知用坤者也。」<sup>37</sup>說明易者，聖學之大用，易之用，體一用殊，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乾坤之德，體也，時措之宜，各有所用，而釋、墨、莊、列，不知此理，強求尚天體，而不知自強載物之道。此王夫之以易學之體用，將聖學與異端加以區分貶抑也。<sup>38</sup>

除了區別貶抑異端，王夫之更甚而針對佛老學說，進行嚴厲的攻擊。<sup>39</sup>王夫之批評佛老，空求本體，忽視其用，不關心人事，缺乏經世致用的精神。如《周易大象解·損》：「釋氏所為，戕性殘形以趨涅槃；老氏所為，致柔守錫以保嬰兒，皆不知損，而戕道以戕性矣。」<sup>40</sup>說明損卦之義，在於非欲非忿，樂而不淫，怒而不戾，和平欣暢，而佛老不明此理，與道相違，故戕性殘形。又如《周易大象解·離》：「老氏一以悶悶孩天下。」<sup>41</sup>《周易大象解·咸》：「老莊之詭於易也以此。」<sup>42</sup>《周易大象解·升》：「若老氏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是謂逆理。」<sup>43</sup>皆批判佛老，空談虛理，守柔虛靜，不務世事，缺乏人世精神。

總之，《周易大象解》是此時期主要代表作，王夫之撰作此書時，明朝政權已亡，但仍然繫念濟世之心，充滿經世淑世的理想。觀其書，或貶抑異端，或攻訐佛老，旨在勉勵君子學易，當實踐聖人之學，以弘揚聖學為己任。

#### 四、三變一《易》學精熟大總結

乙丑（1685），王夫之年六十七，這時清廷已平定三藩，收復台灣，確立了政權的鞏固。在學術思想上，採取尊崇程朱理學的政策。王夫之仍舊不仕新朝，繼續著書立說。居石船山下湘西草堂，病中勉為從遊諸子撰《周易內傳》六卷和《周易內傳發例》一卷，是此時期的易學代表作。<sup>44</sup>

《周易內傳》對《周易》全篇經傳文字進行系統地詮釋，並發揮其易學獨發之創見；《周易內傳發例》則概括重要解易原則和體例，二書可謂其一生易學思想之總整理。

思想，也鍛煉了辯析名理的能力，故能以佛、老反擊佛、老。

<sup>37</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53。

<sup>38</sup> 王夫之舉聖學與異端相較者，又如《周易大象解·益》：「損以治情，益以進道。知所損益，可與入德矣。……此聖學易端之大致，不可不辨也。」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74。

<sup>39</sup> 在對待佛、老二氏的態度上，王夫之與其他明遺史事《易》學家之思想觀點未盡相同，如金士升雖有反佛、道之語，然其反佛、老二氏，僅針對「寂滅」之說而發，並非全然加以否定。夫之於《外傳》中，多處指佛、老為異端、鬼道、小人之道，對佛、老的批判，可謂不遺餘力。曰慎《爻微》指謫佛教為「寂滅」，此一觀點與金士升《易內傳》相近，然士升反佛兼反道，曰慎反佛，不反道，看法則異。夫之排擊佛、老，其力道遠甚於士升、曰慎。詳參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頁 163-164。

<sup>40</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73-674。

<sup>41</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69。

<sup>42</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69。

<sup>43</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76。

<sup>44</sup> 此時期王夫之另有發揮易學思想，但非純粹解易之作，有《張子正蒙注》、《思問錄》。

此一時期，屬王夫之《易》學精熟期，也是一生研易的總結。就易學成就而言，王夫之在易學史的地位，足以媲美朱子。當代學者給予極高的評價，如曾春海認為，王夫之的學術地位，足以和朱子分庭抗禮。<sup>45</sup>朱伯崑指出，王夫之的經學和哲學，是對朱熹以後道學的總結。

46

王夫之曾概述其易學研究成果，《周易內傳發例》云：「大略以乾坤並建為宗，錯綜合一為象，彖爻一致、四聖一揆為釋，占學一理、得失吉凶一道為義，占義不占利、勸戒君子不瀆告小人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訓、闢京房陳搏日者黃冠之圖說為防。」<sup>47</sup>概括了其易學宗旨，解易原理及體例，對於王夫之易學具有高度的總結性。

吾人以其易學綱領，也是解易的首要原則—「乾坤並建」為例，說明此一時期的總結性特色及成就。<sup>48</sup>乾坤並建說的思想，於青年時期的著作《周易稗疏》，已初見端倪，王夫之云：「卦各有六陰六陽，陰見則陽隱於中，陽見則陰隱於中。」<sup>49</sup>實乾坤並建說的濫觴。<sup>50</sup>

其後，中年時期代表作《周易外傳》，始提出「乾坤並建」的主張，且作了全面的論述。王夫之云：

〈序卦〉非聖人之書也，乾坤並建而捷立《周易》以始，蓋陰陽之往來無淹待而嚮背無吝留矣。<sup>51</sup>

所謂「乾坤並建」，乃強調乾坤二卦相反相成，《周易》卦序是始於乾坤二卦，不是始於乾卦「嚮背」，指乾卦中有六陰，坤卦中有六陽，各有十二陰陽來往於嚮背十二位之中。王夫之據此，指出〈序卦〉非聖人之書，試圖建立起獨特的思想體系，作為其易學和哲學的基礎。<sup>52</sup>依其「乾坤並建」的理論，闡述乾坤兩卦演變為六十二卦的順序，反對〈序卦〉的卦序，<sup>53</sup>並以

<sup>45</sup> 曾春海：「朱熹與王船山分別是中國第十二世紀及第十七世紀集大成式的理學家。兩人學問涉獵之廣，用力之深，著作之多，前後呼應，相互媲美。」詳參氏著：〈船山易學與朱熹易學觀之比較研究〉，《哲學與文化》第20卷，第9期（1993年9月），頁870。

<sup>46</sup> 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6。

<sup>47</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646。

<sup>48</sup> 王夫之云：乾坤並建為《周易》之綱宗，篇中及《外傳》廣論之。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618。

<sup>49</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731。

<sup>50</sup> 廖名春等，以為王夫之「乾坤並建」理論首見於《周易外傳》，此說有待商榷。詳參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頁333。

<sup>51</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420。

<sup>52</sup> 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云：〈序卦〉非聖人之書，愚於《外傳》辨之詳矣。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638。

<sup>53</sup> 王夫之於《周易外傳·序卦》，將《周易》中〈序卦〉的解釋，歸結為三種說法，云：「其為說也，有相因者，有相成者，有相反者。」然後一一辯證，作出結論，以為這三種說法不能成立，云：「三義不立，而舞文以相附合，故曰非聖人之書也。」在夫之看來，〈序卦〉對六十四卦順序的解釋，是無法自圓其說的。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1042-1064。

此批判漢易中的卦氣和邵子先天卦序，<sup>54</sup>成為其易學一大特色。<sup>55</sup>事實上，王夫之提出「乾坤並建」說，是針對朱子卦變說而發，《周易內傳發例》云：

朱子師孔子以表彰六藝，徒於《易》顯背孔子之至教。故善崇朱子者，捨其注《易》可也。……則朱子之於《易》，舍周公以從術士苟簡之術也，於此可以知朱子之過矣。

56

不僅懷疑朱子何以一方面採用漢、魏「象數」流弊之術以及邵雍等「畸人」所設迷信之圖，另一方面，又發現朱子「卦變」體系完全不一致，種種現象以及衍生的諸多疑點，致使王夫之強烈地質疑朱子，最後提出結論，《易》學史上，朱子地位是可以除名的。<sup>57</sup>

平心而論，王夫之認為《易》學史上，朱子地位是可以除名的，或有過於武斷處，然卦變說，本身並非《周易》原旨，朱熹持其卦變說，分經析義，隨處乖違，不能彌縫，前後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王夫之不僅指出朱子卦變說的謬誤，更提出「乾坤並建」的創見，在易學史和哲學史上超越了朱子的思想水平。<sup>58</sup>

同樣地，王夫之提出「占學一理」，也是針對朱子「《易》本卜筮之書」的批判。<sup>59</sup>王夫之認為易乃窮理盡性之書，存天人性命之學，並發揮張載「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主張《周易》之占不是占問個人禍福，而是教人通曉義理，辨別義利，改過遷善，做一個道德完善的人。認為占筮不是占來事之吉凶，而是占是非善惡的後果。<sup>60</sup>

事實上，王夫之早年的著作《周易稗疏》，雖以訓詁考證見長，但批判朱熹《易》本卜筮

<sup>54</sup> 如《周易外傳·序卦》，夫之云：「此京房八卦世應之術，邵子八八相乘之數所以執一以賤道，而《周易》之妙則固不然也。」「無其理，無其實，無其象，無其數，徒為戲論而已。此京房候氣之鄙說也。」「凡綜卦有錯，用綜不用錯者，以大化方來方往，其機甚捷，而非必相為對待，如京氏、邵子之說也。」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1042-1064。

<sup>55</sup> 朱伯崑認為，王夫之晚年作《周易內傳》，對「乾坤並建」的主張，雖然「亦未敢信為必然」，但其觀點或思維始終沒有改變，在易學史和哲學史上，都有重要的意義，甚至在某些部分，已突破邵子和程、朱的水平。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100-110。

<sup>56</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646。

<sup>57</sup> 詳參高志成：《王夫之、李光地對朱子《易》學的繼承、批判與發展》（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頁505。

<sup>58</sup> 朱伯崑極力推崇王夫之乾坤並建說，以為此乃王夫之的創見，在易學史和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明確指出，王夫之乾坤並建說的理論思維，突破了朱熹的理論體系，此外，在本體論方面超越了程朱的水平，在論證陰陽雙重性部分又超越了邵雍和朱子的水平。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15，100-116。汪學群亦肯定王夫之乾坤並建說的理論價值，說明了陰陽是既對立又相互依賴，相輔相成的共生關係，是對傳統辯證思維的一個發展。另外，乾坤並建也有社會意義，說明乾坤兩卦是平等的，客觀地淡化了傳統上乾尊坤卑的等級觀念。詳參汪學群：《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頁149。

<sup>59</sup> 朱熹認為《易傳》並不完全符合卦爻辭之義，《易傳》使易本卜筮的原義湮滅了，於是將《易傳》獨立於經，並對筮法、占法特別重視，故《周易本義》卷末附有〈筮儀〉一篇，《易學啟蒙》中〈明著策〉一篇，專論筮法，又撰〈著卦考誤〉駁斥郭雍《著卦辨疑》。

<sup>60</sup> 王夫之「占學一理」的相關主張，如「占易、學易，聖人之用易，二道並行不可偏廢也。」（《發例》）說明學易目的在於言行無大過，占易目的在於通曉事理，無非是企圖以儒家道德義理取代占筮迷信思想。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20-22。

之書的思想，已初露曙光，如《周易稗疏》云：「莫非自然之象，苟非自然，則俗盲卜人，軌革卦影，獸頭人聲，男冠婦袂，以禍世誣民者，豈聖人立誠之辭也哉。」<sup>61</sup>說明王夫之早年便意識到了，卜者專言吉凶禍世誣民之蔽。中年以後，王夫之以闡揚聖學為己任，撰有《周易大象解》，云：「易以筮而學存焉，唯大象則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於筮。」<sup>62</sup>強調學易，反對占術，故而對《周易·大象傳》特別作了新的解釋，企圖以儒家的道德原則，代替古老的占筮迷信。於是乎，在晚年著作《周易內傳》及《周易內傳發例》，更全面地論證，將占易與學易並舉，認為占易與學易，二者並行，不可偏廢，進而提出「占學一理」主張。<sup>63</sup>

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即云：

朱子學宗程氏，獨於易焉盡廢王弼以來引伸之理，而專言象占，為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幾、言精義、言崇德廣業者，皆非義文之本旨，僅以為卜筮之用，而謂非學者之所宜講習。其激而為論，乃至擬之於火珠林卦影之陋術，則又與漢人之說同，而與孔子〈繫傳〉窮理盡性之言，顯相牴牾而不恤。由王弼以至程子，矯枉而過正者也；朱子則矯正而不嫌於枉矣。<sup>64</sup>

足見王夫之極不贊成朱子視《易》為卜筮之書，因為如此一來，無異否認了《易》作為人生哲理之書的特點。甚至，聖人的典籍，貴為五經之源的《易經》，將淪為數術、迷信的等同價值，這是王夫之所無法接受的。職是之故，王夫之不得不對朱子「《易》本卜筮之書」的立論有所評論。

當代學者，關注王夫之對朱子「《易》本卜筮之書」的評論，有持反對意見者，如汪學群認為，王夫之對朱熹的評論過於偏激，朱熹把《易》視為卜筮之書，是從其最初形成意義上講的，並未否認自孔子治《易》後，《易》已經不是卜筮之書。<sup>65</sup>朱伯崑指出，「王夫之對朱熹的批評，所謂尚占而不尚學，實乃誤解。所以有此誤解，由於朱熹易學吸收了圖書學派特別是邵雍的象數之學的觀點。」<sup>66</sup>

對於朱子取邵雍觀點以論「象數」，而王夫之鄙視邵雍「象數」，進而否定朱子《易》學。

<sup>61</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93。

<sup>62</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51。

<sup>63</sup> 《周易內傳·繫下》：「占與學初無二理。」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566。《周易內傳發例》：「占易、學易，聖人之用易，二道並行，不可偏廢也。」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15。《周易內傳發例》：「即占即學，豈有二理哉。」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33。

<sup>64</sup> 詳參明·王夫之：《船山易傳》，頁 613。

<sup>65</sup> 詳參汪學群：《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頁 21。

<sup>66</sup> 朱伯崑認為，朱熹以易為卜筮之書，是就《周易》之本義說的，但不否認研討《周易》中之義理。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 17。高志成也認為，王夫之對朱熹的評論，其實是一種誤解，因為《易》本卜筮之書的「本」字，是「源頭」之義，並未否認《易》有「義理」之內涵性。然而高氏並未進一步說明，王夫之對朱熹的誤解，其因為何呢？是純粹個人因素或時代背景使然？詳參高志成：《王夫之、李光地對朱子《易》學的繼承、批判與發展》，頁 171-177。

<sup>67</sup>此一說法，有待商榷，因為，此一問題，涉及朱子對邵雍《易》學的取捨態度，因為朱熹對邵雍《易》學並非全然承繼，而是有所修正。所以，王夫之並未完全否定朱子《易》學。此處須更進一步深論者，對於邵雍的主張，朱子與王夫之所採取的態度，有所不同，朱子是借邵子之說，以證己論；王夫之是完全否定邵子之論<sup>68</sup>。要之，朱子借之，夫之非之。不能將朱子與邵子之學等同論。

總之，朱熹對邵雍《易》學既然並未全然繼承，而是有所修正。王夫之因朱熹易學吸收了圖書學派特別是邵雍的象數之學的某些觀點，便對朱子易學全盤否定，這樣的學術態度是有待商榷的。<sup>69</sup>然而，就整個易學發展史來看，王夫之勇於突破朱熹所確立的理論體系，在某些易學思想方面，尤其是《周易》哲理化的部分，已經超越了朱熹的水平，這是相當值得肯定的。<sup>70</sup>

## 參、結論

由上述可知，明遺王夫之研《易》凡四十載，歷經三變，呈現耀眼的《易》學光芒。關於王夫之易學的發展與特色，歸納以下幾項要點：

- （一）王夫之《易》學發展，由徵實之學奠基礎，初變為史事易學重實用；再變則弘揚聖學反佛老；三變《易》學精熟大總結，就內在思想理路觀之，雖變卻有所不變。王夫之研《易》雖歷經三變，然其重視人事的宗旨是不變的，表現了明代遺民，重用世、反空虛的特色。
- （二）就各期易學著作特色來看，易學之變來自時局之變。青年時期徵實之學，側重《周易》

<sup>67</sup> 如曾春海云：「船山不滿康節斤斤於刻營方圓圖。連帶的，朱熹將康節九圖置《周易本義》之首，且堅持《易》原為卜筮而作的卜筮之書，亦被船山所斥責。」詳參氏著：《易經的哲學原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年3月），頁354。

<sup>68</sup> 據筆者考查，僅《周易外傳》一書，王夫之批評邵子者，便有16處之夥。詳參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頁246-247。

<sup>69</sup> 錢穆《朱熹新學案》對朱熹的易學極為讚賞，屢屢肯定其易本卜筮之書為創見，錢穆云：「朱子於易，雖多創通之見，而無不有其精確細密之論證。謂易是卜筮書，最為大膽創論。」又云：「前人說易，皆從義理上探求，惟朱子一由卜筮而推，可謂石破天驚。」詳參錢穆：《朱熹新學案》第4冊，（臺北：三民書局，1989年11月），頁6-11。侯雪娟認為，朱熹對《易》書卜筮性質極力強調推求本源，其意並非真要以《易》書占卜而是想通過占卜這種形式體悟發明《易》書的微言精蘊追尋其義理奧義之真諦。詳參侯雪娟：《朱熹象數易學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頁144。事實上，朱熹主張易本卜筮之書，是有其學術思想背景的，錢穆《朱熹新學案》便指出，此與呂祖謙恢復古本《周易》有關，朱熹依古本《周易》說解，故有此卓見。詳參錢穆：《朱熹新學案》第4冊，（臺北：三民書局，1989年11月），頁6-11。李威熊亦云：「（朱熹）易學主要在恢復古本。」詳參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冊，（臺北：文史哲，1988年12月），頁337。

<sup>70</sup> 朱伯崑極力肯定王夫之的易學成就，謂其使《周易》哲理化的發展達到高峰，並認為王夫之的《周易內傳》與王弼《周易注》、程頤《易傳》，並列易學哲學史上的三大名著。詳參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四卷，頁18。

文字，與其應制科舉不無關係；壯年時期經歷國亡家難身險，始講究通經致用，故以史事易學見長；中年時期清政權稍穩，以維護傳統，弘揚聖學為己志；晚年清廷平三藩，天下底定，各方面走向正軌，提供其沉潛深思的客觀環境，也正是其治《易》四十年來總結的最佳時機。

- (三) 就易學發展史而言，王夫之易學有著諸多突破與貢獻。王夫之《周易稗疏》力駁宋人圖書之謬，學風所及，清初毛奇齡、黃宗羲撰、黃宗炎、胡渭等，對宋人圖書之學作深入地考證，解決了易學研究上的一大疑案。《周易外傳》以援史證易為主要特點，其援引史事者，有四十九卦之多，佔全書四分之三以上，王夫之可謂典型史事易學家矣。《周易大象解》乃發揚聖學，貶抑異端，攻訐佛老，力求「盡人合天」，發揮經世致用的精神。《周易內傳》與《周易內傳發例》，二書可謂其一生易學思想之總整理，其易學綱領，即解易的首要原則—「乾坤並建」，不僅指出朱子卦變說的謬誤，在易學史上超越了朱子的思想水平。同樣地，針對朱子「《易》本卜筮之書」的主張，王夫之提出「占學一理」，突破朱熹所確立的理論體系，在《周易》哲理化的部分，已經超越了朱熹的水平。

綜上所述，明遺王夫之的易學成就，一方面代表朱熹以後的再一次易學總結，另一方面，代表研易態度的轉變，由明末空談性理的理學（心學），轉向通經致用的經學，代表宋明以來易學思想的總結，也是清代易學的啟蒙者，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文獻

- 漢·司馬遷，瀧川龜太郎編：《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書局，1991年7月。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1994年7月。
- 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論語注疏附校勘記，2001年12月。
-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2001年12月。
-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元·脫脫著：《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11月。
- 明·王夫之：《周易外傳》，《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明·王夫之：《船山易傳》，臺北市：夏學社，1980年。
- 明·吳曰慎：《周易本義爻徵》，《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 清·李光地：《周易折中》，臺中：瑞成書局，1998年。

### 二、近人著作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市：麥田出版，2010年5月。
- 方紅姣：〈批判的新儒家與船山哲學〉，《周易研究》第1期(總第135期)，2016年，頁91-96。
-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臺北：藍燈，1991年9月。
- 汪學群：《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
- 汪學群：《清初易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11月。
- 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
- 吳懷祺：《易學與史學》，臺北：大展出版社，2004年12月。
- 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冊，臺北：文史哲，1988年12月。
- 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
- 李皇穎：〈試論明遺吳曰慎之史事易學〉，《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1卷第22期，2015年，7月，頁167-205。
- 李皇穎：〈明遺葉矯然史事易學特色〉，《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18期，2016年11月，



頁 27-42。

林文彬：《船山易學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 年。

林士勛：《明代史事易學四家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年。

侯雪娟：《朱熹象數易學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

唐鑑：《清學案小識》，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 8 月。

徐世昌：《清儒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79 年 4 月。

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高志成：《王夫之、李光地對朱子《易》學的繼承、批判與發展》，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年。

陳祺助：〈王船山與戴東原哲學較論〉，《興大人文學報》第 54 期，2015 年 3 月，頁 103-133。

曾昭旭：《王船山哲學》，臺北：遠景出版社，1983 年 2 月。

曾春海：《易經的哲學原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年 3 月。

張麗珠：《清代新義理學－傳統與現代的交會》，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 1 月。

黃忠天：《宋代史事易學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年。

黃忠天先生：〈史事宗易學研究方法析論〉，《周易研究》第 5 期（總第 85 期），2007 年，頁 41。

黃忠天先生：〈葉矯然《易史參錄》述要〉，《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28。

黃忠天先生：〈世變與易學—清初史事易學述要〉，《經學研究集刊》第 5 期，2008 年 11 月，頁 125-144。

張學智：〈王夫之陰陽向背說的本體意義〉，《周易研究》第 3 期（總第 113 期），2012 年，頁 13-19。

廖名春：《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 7 月。

劉大鈞：《周易概論》，成都：巴蜀書社，1999 年 12 月。

劉秀蘭：《宋代史事易學之義理分析》，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劉秀蘭：〈學貴自得－論宋《易》的復古與啟新〉，《經學研究集刊》第 9 期，2010 年 10 月。

魯鵬一：〈王船山卦變說釋義〉，《周易研究》第 3 期（總第 113 期），2012 年，頁 51-57。

錢穆：《朱熹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89 年 11 月。

